

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重构

刘庆昌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中国大学在发展中隐藏着某种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既表现为大学精神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语,也表现为既有的大学精神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无力。精神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大学自身发展及大学与社会互动中的困惑。把新时代精神和大学传统合理对接,应是释解大学发展中的精神困惑和重构中国大学精神的必要环节。人本、效率、和谐是新时代精神的基本要素;目标现实、过程自由、适度独立、积极应变是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关键词。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精神;时代精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8)03-0161-10

当一个人文系统满怀理想却在发展中问题丛生、矛盾重重时,对于这一系统的自觉反思就应该开始了,而中国的大学目前已到了这样的时刻。无论政府采取怎样的建设性措施,还是学校进行怎样的内部变革,大学似乎都难以实现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审视学校内外的各种策略,立意在感觉上都很高,但回头再看具体的手段,不乏简单和短浅之举。从整体上讲,大学发展在其表层已经竭尽全力,在其深层则隐藏着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精神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语,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既有的大学精神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无力。失语,主要是因为大学精神被悬置;无力,主要是因为既有的大学精神在现实中失去了根基。大学精神之所以被悬置,并不是因为办学者不明事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曾经与现实高度融合的传统大学精神越来越成为一种漂浮在现实之上的观念,甚至成为越来越久远的历史故事。如果

再考虑到发端于欧洲的大学直至19世纪末才被移植到中国,就能够理解传统的大学精神在中国的实现无法摆脱短期和局部的特征。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基础并延续了自己文化灵魂的大国,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办大学,需要在思维上把大学固有的精神和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才能让办学者避免诸多无谓的纠结,也才能让他们不至于因为思想的纠结而简单悬置大学精神。换言之,面对大学发展的大趋势,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为中国大学精神的重构做些思考,为我国大学的健康、科学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大学发展实践中的精神困惑

既然要言说重构,就说明中国大学的精神已然客观存在,并非空无,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提到的大学精神在人们的观念中是曾经属于真实、后来渐渐

[收稿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刘庆昌,男,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

式微的一种现象。笔者由此联想到一种思潮,即多年以来,文化教育领域多有对过去大学的追忆和迷恋,并以此为据评论今天的大学。平心而论,此种文化怀古现象虽然有些书生意气,却内含有理想之人的大学理想。毕竟,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短暂而局部的优秀大学实践,只是因为大学并未与不断变迁的时代形成持续的良性互动,才导致持有传统理念的人们在新环境中的内心纠结。一旦这种纠结看似已无释解的路径,与大学相关的理想主义者和不得不回应现实需要的办学者,就会陷入精神困惑之中。这样的困惑主要体现在大学自身发展及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两个方面。

(一) 大学自身发展中的困惑

大学自身发展,是指大学在相对独立的运行中不断增强其基本功能的现实过程。具体而言,大学总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来筹谋以提升水平和实现发展,而大学之外的组织和公众也会从这几个方面对大学的能力进行判断。如果大学的独立特征凸显,社会系统只是对作为大学教育产品的毕业生有所需求,办学者们的困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会有,也基本局限于大学内部运行的技术性领域。但当大学再也无法关起门来办学,而成为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功能系统时,办学者及相关人员的精神困惑就成为必然。

1. 人才培养的学术型与应用型 人才培养是大学从无争议的第一功能,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我国大学固然围绕着学生的选拔和培养正常运行,但在办学者们的意识中,学校工作的重心却普遍游离到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之上。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游离并非荒诞,然而今日大学对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偏重并非自觉遵循了大学运行的规律,而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功利主义行为。回顾历史,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中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但这一观点是有深刻的教育逻辑做基础的,与今日大学对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偏重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先生是有育人情怀的教育家,在他的观念中,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此,大学不仅仅要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循此思路,他才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宏论。由此可知,今日中国大学实际的运行逻辑并未完全以人才培养作为起点和归宿。

不过,深入到大学内部,在院系层面的教育维度,仍以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主线,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常规性地鼓励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教学研究。但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内在的困惑,使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形式。多年以来,大学普遍确立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目标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其中,最令人们纠结的实际是关于人才培养的学术取向和应用取向,这种纠结在综合大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大学基本上是以学术取向为主,养硕学閥才是学校的实务,应国家之需则是方向。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形就变得复杂了。就我国而言,1952年,中央政府从培养一大批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以服务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立场出发,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和专业调整,其结果是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以及师范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的实力被严重削弱,加上全面向前苏联学习,原有的英美体系的人文社会学科遭遇重创,大学人才培养的规格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在这一转型中,高深学术研究客观上消退,学以致用观念得以强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进入了新时期,在国际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下,开始自觉与世界接轨,现代学科思维观照下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大学在本科教育层面也逐渐提升了学术品位,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工作中并驾齐驱的重要领域。21世纪以来,研究型大学建设渐成风气,极端之时,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在大学工作中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培养研究型、创造型的人才自然成为大学教育的理想。与此同时,政府在期望大学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即时的、实质性的贡献的同时,期望大学能够在毕业生就业率提高上有明显的提升。换言之,大学在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选择上产生了困惑,其直接的结果是在课程与教学系统未有本质变革的情况下,预先确立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理念。然而,这种理念是普遍虚置的,原因在于学术与应用的纠结依然存在。

2. 科学研究的求真知与重应用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大学优先重视的领域,但大学并未因此而产生质的变化,新知识和新思想也并未因此而层出不穷。这其中情形复杂,此处不论。但就被大学重视的科学研究来说,其自身也存在着价值选择上的纠结。当然,这种纠结并没

有多么严重,在外部因素的鞭策和激励之下,研究者为了现实的利益,在短暂的思想运动之后便适应了外部的要求。具体地说,格物以致知是研究者的本体使命,但在希望大学走出象牙塔去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中,研究者用自己的行动不知不觉中把“求真知”的使命边缘化了,与此同时,积极回应了“重应用”的社会价值。

为了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政府与企事业单位通过经费投资与精神激励,用项目委托或选拔性分配的方式控制了相当比例的智力资源,客观上制造了“课题学术”现象。大学内外的学科和人员能力评价机制、学术资源分配机制,一方面强化了课题学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固化了课题学术。尽管课题从内容上看涵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但可以想象,研究经费的提供者在整体上不会投资他们不需要或不急需的项目,应用研究自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即使受研究领域本位主义思维的影响而立项的基础研究,在课题推动机制和评价机制的作用下也很难触及各个领域最为艰难的问题。这种现实在很强的意义上制约了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其结果是基础研究领域萧条,应用研究的发展也变得不可持续。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创造知识、思想的热情和能力被抑制,学术的虚假繁荣和学科的空壳化成为必然的结果。好在政府的“双一流”建设举措唤醒了大学研究者的本体意识,让他们开始意识到,大学、学科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学科知识和思想的创造力。

3. 文化传承的世界性和民族性 学校自古以来就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大学亦然。传道授业客观上使道和业的接受者获得充实与进步,但其立意无疑是文化的传承。韩愈在《师说》中讲的“道”实为儒家的正统思想,加以演绎可以扩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传道”就是借助教学的过程,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得以世代延传。中国有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思想文化,朴素实用、辩证圆融的人文智慧既是中华民族存在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因而大学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有序传承责无旁贷。但现实地看,中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作为乏善可陈,实际存在的传承多局限于学科专业教育的范畴,对于广义上“国学”专业之外的学生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除了一些只言片语,其余大致近乎传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上

作为不足。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虽然此文件主要指向中小学,但就其精神而言同样适用于大学。或许有人会说人类已经进入到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无法不参与人类层面的竞争,因而不必刻意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做专门的功课。对此,我不予苟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国际化到什么程度,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么牢固,全世界的人也只能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全人类可以思考和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具体的人群只能站立在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土壤和文化土壤上,这与一个国家和民族有没有开放的心态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一个人从小就生长在异国他乡,他几乎没有可能像域外的个体一样思考源自域外的文化命题。自然科学研究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但人文社会科学恐怕只有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的传统,才可能发散出独特的魅力。

当然,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已经无法避免,文化竞争也成为无法规避的问题,这就需要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具有开放的心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使如此,各个国家也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问题,而是在真正大同的世界成为现实之前保持各个国家和民族精神自信和创造活力的有效策略。维持本土文化的合理延续不仅与人类文化的共同创造不相冲突,而且是发挥不同文化特质对人类共同文化创造独特作用的必要过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今日世界所谓的先进文化也不过是某个民族的文化。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发展,以平静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自信对待自己的文化,才能够避免邯郸学步的结局。大学在实现文化传承中的困惑说到底是在意识中搁置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融合背后的国家发展逻辑。倘若大学教育工作者能够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既有的困惑很可能不再是问题。

(二) 大学与社会互动中的困惑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是困扰大学发展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已有充分体现,而其根由则在于大学的社会功能本身就内含某种“对立的统一”。

首先,大学对社会的引领和为社会的服务容易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纠结。其原因在于社会所要求的服务不完全是大学通过履行基本职能而无需刻意服务,而是强调大学利用自身的特殊资源对社会的直接服务。我国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这中间隐含着两个重要的期望:一是期望大学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二是期望学校能够把学生培养成为有专业本领的劳动者。对于这两种期望,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教育工作者往往容易钟情于后者,在客观上等于回避了大学与社会的现实联系。然而,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的实践理性只有在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真正形成。教育者、研究者也许更愿意沉醉于认知和传道授业,但他们很可能忽略了具有社会性的自身作为已经属于社会的政治实践。大学对社会的引领,既存在潜在的和间接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显在的和直接的服务来实现。道德的和价值的示范是引领,知识的和技术的服务也是引领。概言之,大学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以服务的方式实现自己引领社会文明的功能。

其次,大学的内在追求和社会责任也容易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纠结。这种纠结与大学教育工作者对于大学历史知识的短缺不无关系,要知道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过去的大学是既独立又自由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正视了社会的需要。佛罗斯特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时代需要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法律、医药、神学和文艺等都是需要有能力的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而大学正是提供这种经过很多训练的人的地方。”^{[1](P.159)}虽然在大学发展的某个阶段,其“象牙塔”的色彩较为浓厚,并有像约翰·亨利·纽曼、赫钦斯这样的捍卫者,但也有面对现实、强调大学社会责任的人。德里克·博克就认识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2](P.77)}。这样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一种具有务实精神的现实主义立场。应该说,大学作为精神的高地与社会的服务站在今天也许不该有严重的龃龉,原因是高等教育系统已经成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大学集合。大学层次化和专门化的直接效果就是不同的大学可以履行不同的职能,现实的问题是层次和性质不同的大学被同质化的大学发展标准裹挟,以致研究型的文

理大学在追求实用的社会服务,而应用型的大学在追求高深学术。

二、新时代的要求与大学传统的对接

或许可以这样说,大学发展中的精神困惑是历史传统和时代要求相互磨合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行业”内的人们通常更乐见一种纯粹,而作为投资者的社会则希求一种回报,并会把钟爱纯粹思想和行为看作是一种保守。这实际上是不同的本位主义思维的必然结果,大学的发展只有在内部纯粹理想与外部现实期望之间的动态平衡中才能进行,极端保守和极端务实都不能成为最佳的选择。无论社会对大学有多么现实的要求,大学自身的优秀传统都不可丢弃;无论精神的纯粹和高卓如何富有魅力,现实的需求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都必须面对。把新时代的要求和大学传统进行合理对接,应是释解大学发展实践中的精神困惑和重构中国大学精神的必要环节。

(一) 不可丢弃的大学传统

大学究竟有哪些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自大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大学都形成了自己相对突出的特色。有研究者撰文总结得出:中世纪大学的传统是世界精神和超国界性格;英国大学的传统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德国大学的传统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美国大学的传统是从象牙塔到服务站;苏联大学的传统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3]这样的总结虽然抓住了不同国家大学的一些特征,但总体上比较凌乱,标准也不统一。笔者认为,对于大学传统的总结,应使用历史抽象的方法,把握整体的和共性的传统。

1. 研究高深学问 最初大学只是与手工业、商业行会并列的组织,不同的是,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者团体。尽管在中世纪,信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只要不触及神学,大学内部的学术研究是比较自由的。这种自由对于学问的精进来说至关重要,以致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在中世纪大学经院哲学的争论中就埋下了伏笔。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看,对高深学问(课程)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可以想象,当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聚集在大学时,相互的辩争难以避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中的应用,足以把宗教神学的研究推向顶峰,进而没有预谋地为

自然科学的兴起奠定基础。

今天,大学无疑默认了研究高深学问的传统,但它所默认的研究高深学问却与较近的德国大学有关。因为德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德国学者多认为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在哲学的过程中才能如鱼得水。人们经常提及威廉·冯·洪堡的柏林大学理念,实际上从康德开始就对大学有了深入的思考。康德主张大学须以真理为中心,并让自由和真理统领一切^[4](PP. 62~63)];“谢林在考察了大学学问的特殊性即大学知识具有整体性和大学学习具有非功利性之后,提出大学教师应追求真理、创造知识”^[5]。到了洪堡的时代,以上理念更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当然也更为鲜明和直接。“洪堡的观点被凝练为现代大学的四大支柱:(1)教学和科研统一,大学应促进知识的创造、保存和传播;(2)‘教的自由’(Lehrfreiheit)和‘学的自由’(Lernfreiheit)互相补充;(3)自主探索真理过程需要‘孤独’(Einsamkeit)和‘自由’(Freiheit);(4)习明纳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体的主要研讨制度。此即闻名于世的‘洪堡理念’。”^[5]对于洪堡的理念,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神话,与柏林大学的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机构的观念对德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的确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我国,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宏论广为流传,却不知他1931年在同一篇就职演说中还有“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句。统合起来,便可知梅贻琦意识中的大学也是教师和学生做高深研究的地方。结合蔡元培先生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讲时说过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大学建设之初就是把研究高深学问作为基本任务的。或许有人不解,即大学乃教育机构,本应以培育人才为己任,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研究高深学问并已形成传统呢?其原理是:高级的人才只能通过高深学问的研习过程才能得以造就。大学教师是不同于中小学教师的,他们虽然也必须传授知识,但因担负培养学生优异思维品质的重任,必须把知识的传授融入学问的研究和观点的论争中,才能够完成任务。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大学教育中的“教学和科研统一”。

2. 引领社会文明 大学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自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引领社会文明的意义,只是在

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引领社会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领无需刻意。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在精神文明方面自然处于社会文明的高地,在思想和观念上走在社会公众的前面,具有引领社会文明的先决条件。而大学又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作为教育机构,其教师和学生普遍具有启蒙大众的内在倾向。如此,即使不把引领社会文明写入自己的章程,大学的自然运行也会产生引领社会文明的效果。

二是引领也是一种责任。现实的情况可能是,大学的运行虽然具有自主性,却处于外力的作用之下,在被要求“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其“引领”社会文明的动力客观上在消退。这中间有一个需要明确观念,即“引领”社会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服务”,用新的思维继承优良的传统也是大学在新时代的创造。

大学对社会文明的引领,意味着大学在道德与价值上对公众的示范和对社会文明状况的反思与批判。这一传统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上曾有优异的表现,但在新时期似乎出现了作为不足的情形。有研究者针对部分大学对社会文明进步贡献有限的情形,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思想、理念、价值观引领社会文明进步”^[6]。这一观点是就大学的“社会服务”而言的,作者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应该由一般的技术和咨询服务向思想文化引领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以新代旧,而是服务重心的转变。具体来说,大学对社会的文明引领就是要向社会提供先进的道德伦理标准、思想观念和核心价值观,并以身示范,向社会展示现代文明人的真切形象。除此之外,大学应有义务和勇气对社会文明的现状做必要的反思与批判。所谓反思,即要分析人们在道德思维和价值思维上的现实逻辑;批判则要揭示现实的道德和价值逻辑的局限,并把积极、健康的道德和价值逻辑交给公众。

3. 重视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与大学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基督教世界几乎绝迹,倒是在伊斯兰世界保留了一些。伴随着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不仅带回了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而且带回了古希腊时期的学术经典。“欧洲人开始接触到阿拉伯世界新奇的宗教与哲学,开始领

略阿拉伯人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以及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甚至最终回归到原初的那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7](P.19)}加上9~13世纪的古典文献的翻译运动,欧洲的知识领域活跃起来,现代学术开始萌动,大学的诞生呼之欲出。略去历史演化的叙述,直接说到大学的洪堡时代,重视人文仍然是大学的基本理念,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人的大学理念才逐渐被专业人的大学理念所替代。尽管人文主义教育家从未停息过对技术主义教育理念的抵制和批评,但大学的教育思维仍是由专家、技术思维主导的。

目前,人文学科在大学呈现出衰退的趋势,这是效率思维作用的消极后果,社会甚至大学自身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技术短缺、人文强盛的时代的确定发展缓慢,并会因缺乏索取的强烈欲望而少有活力,但轻视道德、价值的平衡作用又会使社会的发展陷入彷徨与错乱。人类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生活的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需要人文价值的滋养以形成享受幸福的精神意识和能力。大学在为社会物质文明助力的同时,不可丢弃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可以把人类的情感、意志凝成故事、图画、音乐、舞蹈,可以从人类的故事中抽象出生活的理想,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制造出不竭的动力。

(二) 必须面对的时代精神

优秀的大学传统需要坚守,只有这样,大学的精神才可以延续。但也要意识到对传统的坚守很容易滑向保守主义的泥潭。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也走进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大学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通过坚守优秀的传统得以认知大学的本质,需要认真研读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避免大学在新时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缺位和失职。新时代的精神并不是天外来物,它生成于社会历史过程中,是表达新时代理想的精神。

首先,大学需要应生活之呼唤,把自身的传统与时代的精神结合起来。大学是社会系统中的大学。它固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并有其独特的运行原理,但其生命力的持续旺盛则依赖于它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能量与信息交换。社会的变化必然带来大学的变化,否则,大学就会成为社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借用杜威“教育无目的”的观点,可以说大学没有目的。大学若有目的也是社会的目的,大学的存在和运行只是社会存在和运行目的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大学教育者和领导者就

不必纠结于自身的独立与否。以理性而言,在内部运行的技术层面,大学想不独立也得独立;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大学想完全独立也无可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既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也是大学健康存在的基本方式。

其次,在新的时代,大学需要反身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独特资源和能够为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大学的独特资源主要集中在鲜活的文化 and 专门的人才两个方面。新文化在大学,传统文化也在大学。大学集聚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并充满持续创造的动力,这使得新的思想和知识最容易在大学产生和存活。正因如此,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大学总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发出时代的声音,引领时代前行。传统文化在大学,并非罗列在图书馆的文本中,而是运动在教师和学生的传授和研究中,所以才具有了鲜活特征。大学教育的主体最有条件让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精神风云际会并碰撞出耀眼的光华。除此之外,大学是优质智力资源高密度存在的场所,大学对于人类精神创造的贡献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小觑,这也是大学可以为社会直接贡献人力资源的前提。

简而言之,大学通过主动回应社会生活的呼唤和积极地反身思考,必将有助于自身传统与新时代精神的对接。对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概念。我们讲两种事物结合或统一,在操作的意义上恐怕得从对接开始才具有现实意义。大学传统与新时代精神的对接,实质上是两者在人们意识中的对话融合。任何传统都曾是历史上某个时代的精神之合理体现,任何时代的精神都是过去的传统在每一个当下的华丽转型。换言之,大学的传统与时代的精神不会真正地对立,现实中的纠结与困惑不过是相互融合中的摩擦效应。正是在这种摩擦中,大学的传统才被激活,大学的精神才得以重构,进而获得新的活力。

三、中国大学精神的时代重构

新时代需要大学以新的面貌出现,这便需要新的大学精神。新的大学精神既要承接传统,又要体现新时代的价值诉求,质言之就是需要我们重构大学的精神。重构,听起来像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其实不然。此举无疑属于创造,但创造从来就不是主观地制造出天外来物,机理上是旧材料的重新组合,换言之也就是重构。以新时代中国大学精

神的重构为目的,我们需要对新时代的精神进行清晰的把握。即使我们不能一步到位地把握住新时代的精神,但有限的清晰把握至少可以让我们的重构行为不至于离谱。至于大学精神的重构本身,关键在于确立基本的原则与规约机制^{[8](P.11)},并对可以构成新的大学精神的关键词进行必要的阐释。

(一) 新时代精神的要素分析

每一个时代相较于具体社会生活的过往历史都具有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小到具体的元素增益、消除和微妙变化,大到各种元素的排列顺序和原则的进化。当具体社会生活的主体能够自觉到新时代的到来时,社会在结构层面一定发生了无法回避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P.1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客观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人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自足,而是在经济自足的基础上追求生活的精神品位,这必然牵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要求。对于这一点,走进新时代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9](P.257)}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中正在从粗放的数量追求向集约的质量追求转型,支配生产方式的原则已经从曾经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化为内涵丰富的科学发展观。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人本、效率、和谐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新时代的基本精神元素。

1. 人本 新时代精神中的人本,不只是哲学领域的对物理世界的关注向对人自身关注的转变,也不是一种原始、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而是为了个体发展和群体幸福的行动立场。人本的对立面是物本,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对GDP的简单追求,这实际上是忘却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利益与福祉;其教育领域表现为对某些指标性进步的偏执,这实际上是忘却了教育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个人及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讲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8](P.14)},可以说这是对人本精

神的最通俗表达。放眼全球,顺应人民的意愿,也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导性原则。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实际,可以选择不同的社会建设和发展道路,但最高宗旨一定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更重要的是,人本的精神引导政治家和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在思谋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人民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思维是高度的文明和成熟,因为其中蕴含着对“完善”即目的善和手段善的合理兼顾。

2. 效率 效率与生命的本能有关,本质上是用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回报,这里的投入和回报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新时代的精神要素,效率是对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利用有效资源最大限度服务于人类的一种追求。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文明,其源头远在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农业生产的过程与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密切相关,反过来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他们的时间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源不见得充裕,但效率意识只零碎地存在于生产、生活的局部或某一阶段。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尤其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这使人们可以在相同的投入下获得更多的产出,效率意识就具有了普遍性,并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初,历史性地产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承接历史上的“多快好省”、借助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的效率,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提高了管理水平。在此过程中,中国人不仅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而且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新发展。只是物质财富的匮乏所形成的历史反弹,从一开始就把追求效率和人自身的发展割裂开来,以致高增益的物质财富和高增长的精神危机几乎同时发生和持续。社会的确发展了,但这种发展却在整体上得不偿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伴随着党和政府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来,党和政府对于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立意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更高文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同样需要高效率的生产,但尤其突出了平衡发展的理念,并把平衡而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联系起来,足以说明作为新时代精神要素的效率是人本精神理念下的效率。

3. 和谐 从逻辑上讲,以人本为基点、充分考虑人自身利益和发展的效率必然是一种和谐的发展。和谐,在操作的意义上,是社会系统各要素

的合理排列与安置,是各要素在统一的目标下各尽其职、相互配合、高度协调的社会整体运动。和谐,并非掩盖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而是从根本上合理规避不该发生和存在的矛盾;深层的和谐实际上是历史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在科学筹划和人文引领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消退的结果。相反地,不和谐往往是人自己在无法兼顾全体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某一侧面或局部所导致的不平衡。从表面上看,不平衡是结构失衡在人们主观世界形成的感受,实质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充分。我们可以理解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策略,但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策略总体上属于权宜之计。片面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结构的失衡,而社会生产结构的失衡又必然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衡。已成现实的物质崇拜和价值庸俗正是社会发展未能实现深层和谐的产物。现在我们把和谐的精神置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起点上,既是面向过去的反思成果,也是面向未来的时代智慧。

应该说,基于人本理念的效率追求,其所规定的社会发展必然是可持续的。这中间隐藏着一个基本的道理,即为了个体发展和群体幸福的行动宗旨具有终极意义。尽管这一终极目的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有了终极价值的观照,任何阶段性的目标达成行动都不会沦为无格局和孤立的短视行动。无论是社会系统中的哪一个领域,今日发展中积重难返的问题都源自曾经任性的短视行为,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成绩最终会被与成绩共生共长的过失吞噬大半,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使人获得成绩的思维反过来成为继续获得成绩的阻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的一定是短近的利益,不仅不利于具体领域发展层次的提升,而且会间接地边缘化甚至肢解社会文明中的神圣价值。很庆幸我们走进了新时代,人本、效率、和谐从此不再是理想主义者默念的教条,而成为我们在社会各个领域行动的依据。

(二) 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精神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精神,我们要进行的是建构而非描述;我们要进行的建构不是在未来实践中的生成性建构,而是在新时代,依据大学的目的、时代的精神和大学发展的规律,在意识中进行的预先建构。大学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大学精神,而大学的发展却需要一定精神的引领。为了重构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有两件事情必须明确,一是建构的原则,二是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关键词。

1. 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原则 一是立足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是培养人的地方,因此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大学,取决于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韩愈在《进学解》中说:“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其中的“登崇俊良”,本意为提拔优秀人才,近代有的大学(如山西大学)则把它奉为校训——“尊广道艺,登崇俊良”。现实地看,大学的职能多样,但学生的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了学生的培养,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今天,大学还要充分考虑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发展不仅是大学发展的条件,也应该是大学发展的目的。我们讲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要把人视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在此原则下,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均应成为大学发展的立足点。

二是指向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大学具有象牙塔的基本性格,但大学从来就不在社会之外,其历史性的诞生以及转折性的发展无不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不过,大学应社会之需,总体上还是具有被动的特征,它固然因为传递文化、培育人才而自然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它的潜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进一步讲,大学在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方面可以具有进一步主动的和创造性的作为。大学拥有最高端的科学与人文,集聚了最高端的科学专家和人文学者,有条件在“登崇俊良,尊广道艺”之外对社会文明发挥引领作用。悉知此理,大学在建构自己的精神时,就需要具有使命担当意识,在精神的高度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主动结合起来。

三是思谋办学资源的高效益。即使大学要坚守追求高深学问的传统,也不必回避效益问题。大学作为人力资本和知识思想生产部门也是需要投入的,这里的投入既包含大学之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也包含大学内部的智力和道德力量。投入自然要求回报,而回报与投入的比例也就是效益的表征。如果我们期望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回报,这其实就是对办学资源高效益的思谋。

四是保证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发展,必须摆脱曾经发展的局限,力避淡忘初心、搁置教育与研究规律的短视行为。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不讲人本、违背规律的类GDP办学思维注定要付出难以持续发展的沉痛代价。对人才培养的轻视,客观上降低了大学的水平,也使毕业生淡化了经典的母校情结;远离本质

的科研追求,不仅没有为人才培养产生本该具有的教育助力,而且损伤了科研本身的神圣性质。在浮躁的社会风气裹挟下,大学一度把自己的发展寄望于世俗的运作、寄托于外延的进益。现在看来,这既是不当的,也是幼稚的。凡事均有其运行的道理和规律,依靠离经叛道而获取的虚假繁荣最终会被时代精神的浪潮打回原形。

2. 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建构的四个关键词
向实践的方向延伸,我们意识到新时代的大学不应过分流连于象牙塔幻想,而应该为自己确立现实的目标;不应固守过去时代狭隘的教育思维,而应该学会教育专业思维,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挖掘师生思维和想象的潜力,以使他们在教育和研究过程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合理自由;不应一味匍匐于社会的需要之下,而应该自觉意识和实践大学的相对独立,维护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精神^[10];自然也不能关起门来传道授业、探究真理,而应该积极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合理变革,把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融合起来。我们可以把以上的认识凝结为四个关键词,即目标现实、过程自由、适度独立、积极应变,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大学的精神整体。

一是目标现实。新时代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时代,这个时代所要实现的梦想渗透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但它最终的实现却需要我们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行动。我们把“目标现实”确定为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关键词,并不是说现实中的中国大学拥有了过多的理想,而是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上言明大学应该正视社会对大学的多样需求。在这个关键词背后,还隐藏着我们对两种现象的态度。第一种现象是一部分大学教育工作者迷恋于大学的象牙塔神话,刻意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以维护大学最大的自由。这种态度确实具有一定的纯粹性,却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大学虽然是高深知识的运动场,却不是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游戏场。大学的产生源自现实社会的需要,大学的发展需要关怀现实社会的发展。第二种现象是一部分大学教育工作者把大学发展所需的务实态度误解为对现实社会动向的亦步亦趋,他们唯恐大学与现实社会产生距离,进而追求大学在社会系统中的游刃有余。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很像是一种务实,实际上属于放弃自身固有立场的庸俗。正确的认识是:大学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必须以大学特有的能力和方式进行;对现实社会动向的亦步亦趋事实上是

以损失大学的本质为代价的。

二是过程自由。为了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创造性,大学的确需要某种自由,但那种自由既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与大学的本质无关,只能是存在于大学职能实现过程中的自由,因为只有这一过程基本上是由大学教育工作者实际承担的,我们把这种自由称为“过程自由”。任何实践都是追逐目的的过程,任何实践都自然具有手段特征。实践的过程当然会牵涉各种因素和力量,但核心是人的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的生产、运用无疑是需要自由的,也只有这种自由对于大学发展来说才具有切身性和功能性。然而这样的自由并不容易具有,原因是外部的力量会经由大学的管理逻辑间接地影响自由的存在。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大学教育工作者,即使他们内心充满矛盾,通常也会适应某种管理的逻辑,实际上等于在外力影响下自动放弃了这种自由。“过程自由”的实质是大学里的教育活动和研究活动的合理自由,把“过程自由”确定为新时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关键词,实质上在表达对大学里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之专业权利的应有尊重,其意图在于保护教育者和研究者创造性思维和想象的尽可能发生。

三是适度独立。大学需要有现实的立场,以便与社会系统保持必要的能量、信息交换,但大学也需要适度的独立。所谓“适度独立”,其本身就内含现实的态度。具体而言,大学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也不能固守某种近乎神话的独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大学从来没有、也断无可能完全独立,完全的独立实际上只能把大学推向绝境。我们之所以强调独立,是因为只有独立了,大学人才能够心无旁骛地遵循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规律办大学,才能够在大学教育和科研实践中延续来自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精神;之所以明示适度,是因为任何的独立不过是对事物进行静观的效果,现实中的独立都是有条件的,从而只有适度的独立才能够被社会系统理解和尊重。

四是积极应变。积极应变是大学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它是智慧、态度和机制的统一。作为智慧,大学的积极应变是为保持自己的活力、争取社会理解和支持而做出的明智选择。反观现实,那些不能积极应变的大学,最终还是要在外力的主导下转型;如若转型不力,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作为态度,大学的积极应变反映了大学对自身存在方式和职能的自觉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表

达了大学为社会发展有效服务的积极愿望。作为一种机制,大学的积极应变最终要落实到办学思维、课程与教学等具体的领域,始终保持这些领域的开放性,以便根据各种新的社会需求做出科学的和面向长远的调整。

新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确立现实的立场,充分考虑社会系统的多种需要,为自身的发展设定现实的目标。大学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大学自身无所谓目的,大学的目的其实是社会的目的。所以,大学不必争取本不属于自己的目的确定权利,只需争取和维护为实现目的而进行的教育和研究过程的自由。为此,大学需要保持适度的独立,只有这样,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精神才能够被不断发扬光大;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够在不失其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应答。“目标现实、过程自由、适度独立、积极应变”并不是新时代中国大学的精神本身,但这四个关键词却有潜力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的发展;而人本、效率、和谐的新时代精神要素也能够在这四个关键词支配下的大学发展中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 [1] S·E·佛罗斯特.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 吴元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2]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 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3] 贾宝余. 西方大学的传统及其对我国大学发展的影响[J]. 中国大学教学,2005,(3).
- [4] 伊曼努尔·康德. 论教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5] 骆四铭. 洪堡理念与德国高等教育发展[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5).
- [6] 麦均洪,赵庆年. 研究型大学应以思想、理念、价值观引领社会文明进步[J]. 中国高等教育,2015,(Z2).
- [7] 海斯汀·拉斯达尔.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1卷)[M]. 崔延强,邓磊,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 [8] 本书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刘徐湘. 现代大学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精神的回归[J]. 大学教育科学,2017,(5).

(责任编辑 李静丽)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Spirit in the New Era

LIU Qing - c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piritual crisis in our university development. This kind of crisis not only manifests aphasia of the university spirit in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cess, also manifests weakness of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spirit in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cess. Actually, behind the crisis is the confusion of the university's own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spiritual perplex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o reconstruct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in China, it should be a necessary to link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university traditions. Humanism, efficiency and harmony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new age spirit. Goal reality, process freedom, moderate independence and positive response are the key word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piri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University Spiri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alent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